

光环下的另一面：“学二代”的家庭图景与成长困境

■ 刘祎莹 程 猛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通过对多组“学二代”及其家庭成员进行深度访谈和实物收集,研究发现“学二代”家庭致力于提供纯粹性养育的稳定庇护,但竞争压力的渗入又形塑着其中的张力。“学二代”家庭的协同培养模式包括“高压式”“甜蜜漩涡式”与“分工式”,衍生出“亲密有间”的家庭沟通方式。据此,在家庭教养过程中父母要为子女留足自由探索的空间,并基于自身的文化机理展开教育反思,打造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学二代” 文化再生产 协同培养 家庭图景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1.003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一些高频词汇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比如“海淀妈妈”“顺义爸爸”“高知父母”等。这些标签彰显着某种程度的家庭教育比拼。家庭教育参与是新一代成长中的关键一环,也是当下教育内卷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述背景下,具有教育和文化优势的“学二代”家庭成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群体。

高芬·安纳特(Gofen Anat)最先提出“学一代”的概念,指代父母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其自身是家庭中最先进入大学的群体^[1]。在我国,“学一代”通过高考实现流动,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中产知识分子群体。而那些出生在家庭教育氛围良好,父母一方或双方受过高等教育,生长在中产知识分子家庭中的孩子也往往被称为“学二代”。因此,当“学一代”和“学二代”的代际传递构建起一种家庭文化氛围时,便形成了通过教育实现流动和文化跨越的内在机理。因

收稿日期:2023-11-10

作者简介:刘祎莹,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论及基础教育;

程 猛(通讯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仲英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教育社会学与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社科一般项目“‘双减’政策下北京市家庭培育模式转变与儿童成长机制研究”(课题编号:SM2023100280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农家子弟的阶层旅行与文化生产研究”(课题编号:18CSH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此,“学二代”的成长过程交织着传统和现代、乡土和城市、过去和当下的对立,这构成了“学二代”生活情境的独特性。

尽管“学二代”及其家庭开始被讨论和关注,但当过度聚焦在更高学历水平的教育时,往往可能走向趋同化的理解,即人们会努力探寻“如何培养更优秀的孩子”,却忽视在教育的渴望背后是否同样存在“物或益之则损”^①的阵痛。事实上,“学二代”看似继承着“学一代”的文化优势,但也存在着家庭养育的困境。“学二代”家庭的文化优势下呈现出的样态类型、教养过程中的困境和试误又有哪些?“学二代”家庭的摸索式培育路径,带给我们怎样的教育反思?通过对多组“学二代”家庭教养路径的分析,本研究试图揭开在理性规划和悉心培养下,“学二代”家庭中隐匿的纠结、困境、试误和探索模式,为理解该群体的家庭教育与生活境遇提供参考。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依据

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中,文化再生产是一套契合中上阶层的完备系统化方式,通过教育中的文化契合,使人们主动接受或遵循规则。通过社会出身和无意识的行为和惯习,以教育方式实现隐性的文化再生产过程^[2]。如布尔迪厄所言,尽管在成长过程中,文化积累不能超越个别行动者及其表现能力,但它却可以通过教育过程实现隐性的代际传递^[3]。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是文化优势的主要来源,也是造成人们生活品质差别的重要因素^[4]。因此,精细而又理性的教育规划成为一种文化再生产策略。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进一步发现,不同阶层的家长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中的程度和广度存在差异,背后正是家长运用自身社会优势促进孩子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5]。因此,拉鲁提出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主要是个体如何用文化优势^[6]。

在文化的生产场域中,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呈现出理性教育和精细规划的特点,布尔迪厄称他们为中产阶层的“文化贵族”^[7]。他们具备安稳的职业和收入,在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符合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相对于其他中产阶层,高知家庭是最具教育信念且拥护文化再生产逻辑的群体^[8]。因此,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孩子容易获得良好的家庭氛围、细致规划的教育、拥有认知世界和实践社会参与的机会、优先且多样的学习途径、高雅趣味与审美品味^[9],他们常被认为是充满教育与文化优势的群体。美国社会学家斯蒂芬·鲍尔(Stephen J. Ball)发现,相对于其他中产阶层群体而言,中产知识分子家庭更愿意通过教育保持和延续其优势,特别是在子女的学校选择中的做法、期望、经验和价值观等方面,家庭教育起着重要作用^[10]。哈瓦特(E. M. Horvat)也发现,高学历背景的家长往往以积极教育观为子女规划出系统性的教育计划,提供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环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起到监管和把控作用^[11]。从理论层面而言,社会学家对文化再生产理论的验证和拓展,也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社会对文凭的技术功能倾向,同时造就一种顺应文化再生产的合理情境。

^①此处提出教育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物或益之则损”是与程猛、康永久所写的《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言说》一文中农家子弟的自然成长教育产生对话。

尽管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理性教养与精细化养育对子女的学业发展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无法精准预测自身教育行动的结果以及子女的未来,其中依然可能存在着高度焦虑。布朗(Brown)发现,牛津、剑桥与常春藤大学的招生标准从科层典范转向弹性典范,从传统的专业知识转向能力、才能、人格魅力等因素。因此,在现代家庭教育参与中不仅需要帮助孩子学业上有所成就,而且在维持其生活习惯和培养气质风范方面有了更多要求^[12]。爱丽(Eileen)关注到“白热化”的中小学教育市场传达的中产焦虑与悖论。既想让自己孩子拥有快乐的生活,又不想孩子在学业竞争中掉队,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在教育的功利价值与文化教养功能之间处于矛盾处境^[13]。

在我国本土情境中,“学二代”家庭作为改革开放后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其社会地位、工资待遇、福利保障基本上处于社会的中层水平,在孩子的家庭教养、教育投入、惯习养成等方面的文化优势和特点也较为明显。但是,“学二代”家庭作为社会的新中产阶层群体,依然有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局限性,也存在教育投入与理性教养背后的教育焦虑和困境,这些隐性的困境需要深入探究。

三、研究设计

从2018年起,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二代”群体,以主动寻找、相互推荐等滚雪球方式逐渐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通过深度访谈、实物收集及反思札记等方法收集资料。选取研究对象时本研究主要参考以下标准:第一,“学二代”家长为改革开放后家庭中率先考入大学的第一代大学生,一方或双方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已在城市中具有相对稳定的工作。第二,“学二代”为“90后”及“00后”大学生群体,目前就读或曾就读于某大学。自研究开展以来,在2019-2020年期间陆续找到14位“90后”“学二代”作为研究对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考虑到“90后”和“00后”存在代际特征等差异,本研究于2023-2024年期间又补充了6位“00后”“学二代”作为研究对象。表1呈现了具体研究对象编码及访谈对象简介。

表1 访谈对象简介

编码	出生年份	受教育程度+现状	家庭背景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或方式
A	1998	本科(辍学)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18.07	咖啡厅(面对面)
B	1997	本科(已工作)	父亲(硕士)+母亲(本科)	2018.04	咖啡厅(面对面)
C	1996	本科(已工作)	父亲(本科)+母亲(博士)	2018.09	学校食堂(面对面)
D	1997	本科(休学)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18.10	电话访谈
E	1995	本科(已工作)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19.06	咖啡厅(面对面)
F	1994	硕博连读	父亲(博士)+母亲(本科)	2019.10	学校教学楼
G	1997	本科(已工作)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19.05	学校图书馆
H	1991	博士(已工作)	父亲(博士)+母亲(博士)	2019.04	办公室(面对面)

(续表)

编码	出生年份	受教育程度+现状	家庭背景	访谈时间	访谈地点或方式
I	1996	本科(休学)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18.09	咖啡厅(面对面)
J	1999	国外留学(硕士)	父亲(本科)+母亲(博士)	2018.07	家中
K	1997	硕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19.09	学校图书馆
L	1991	博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20.09	学校图书馆
M	1996	国外博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18.08	电话访谈
N	1994	博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19.10	学校实验室楼
O	2000	硕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23.07	自习室
P	2001	硕士(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23.10	学校图书馆
Q	2003	本科(在读)	父亲(本科)+母亲(博士)	2023.11	自习室
R	2005	本科(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本科)	2023.03	学校咖啡店
S	2004	本科(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博士)	2023.05	自习室
T	2003	本科(在读)	父亲(硕士)+母亲(硕士)	2023.11	教室

对于“学二代”的深度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主要围绕“学二代”的家庭背景、家庭教育状况、学习经历、自我认知展开。为了深入了解“学二代”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图景,在取得“学二代”及家长同意的前提下,收集其分享的家庭聊天记录等作为实物资料。这些家庭对话以文字和配图方式呈现,进一步补充了深度访谈的内容。另外,“学二代”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计划表、日程安排表等也作为实物收集的一部分,这更有助于研究者了解“学二代”对于时间、空间、资源、精力的分配与安排。整个研究过程也以反思札记的方式进行记录,以深描和基于个人视角的解释展开。具体包括,一是关于“学一代”和“学二代”个人叙述经历的深描;二是研究者访谈后的反思;三是研究者从局外人视角结合自身经历的反思自省^[14]。形成的反思札记将会作为阐释“学二代”成长脉络的辅助资料,呈现研究者与资料本身的对话。

四、研究结果

在改革开放后,作为通过教育发生代际流动建构起来的“学二代”家庭,具有基于时空迁移、阶层流动、文化折叠的独特属性^[15]。在“学二代”家庭中既能看到积极的教育理念和理性规划的培养方式,也能看到父代对子代学业成就充满复杂的双重情感,还能看到在家庭沟通模式上的代际冲突与情感交织。

(一)“学二代”家庭的教养愿望

1. 稳定的庇护:纯粹性养育渴望

在城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教育的社会性功能被逐渐放大,“读书成才”的期待背后是

以文凭为入场依据的情境,即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提及的“文凭社会”^[16]。当文凭作为一种符号在社会场域被广泛认可时,本身具有高学历背景的“学二代”家庭也可能率先探索一条自由进步的教养路径。深谙应试之苦的家长开始反思是否应该让孩子加入考试竞争的急流中,并以一种纯粹性的教养方式鼓励孩子去追逐自由而又圆满的生活成了教养的愿景。

小时候父母对我学习要求不高,不一定要得第一名。父母倒是鼓励我对感兴趣的东西多试试,找一找未来的兴趣方向。我爸妈说他们这一代已经吃了很多苦了,学习条件艰苦,好不容易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不要求我有多大成就或者抱负,只希望我快乐健康地成长。(访-B-本科毕业工作)

研究中被访对象B的家庭像威利斯眼中一部分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进步者那样,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整合相同的基本范式后,对孩子以及他们的定义和兴趣做出一些让步^[17]。对于子代选择的尊重基于“先验的善意”^[18],也是基于经验的良苦用心。正是由于“学一代”经历过物质和教育资源匮乏带来的艰辛,他们更想为孩子提供一种稳定的庇护,成为孩子实现个人理想的坚定支持者。因而,很多“学二代”家庭试图通过一种纯粹性教养给予孩子学业之外更多的体验感,这种纯粹性教养是基于孩子兴趣和潜力,有规划、有安排的教养方式。他们在试图理解子女、丰富其生命体验时,也在弥补一种缺憾。

因此,“学二代”家庭在纯粹性养育的过程中,强调孩子的兴趣、视野、体验和积累,暂时不以孩子的学业、竞争为硬性要求,而是以孩子的个人成长及体验为导向。“学一代”努力做到认同“学二代”自身价值的实现,不希望子代在竞争中承受过多的压力和负担。伯恩斯坦(Bernstein)曾提及,“在(新)中产阶层中,个人中心型家庭(Person-centered Families)界限维护程序弱或有弹性,家庭成员的差异和权威关系较少以地位为基础,而更多是以人的差异为基础,成员们是在制造角色而不是进入角色,成员间关系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家庭成员的特有品质在交流结构中越来越具有实质性”^[19]。即使未来发展子女未按父母规划的道路前行,但是他们也倾向于尊重子女的选择。

2. 竞争压力的渗入

随着“学区房”“家长考核”等现象愈演愈烈,在教育竞争压力下,对于“学二代”家庭来说,完全做到纯粹性教养并不容易。伯纳德(Barnard Lahire)曾指出,“在家庭中尚未准备好对课外文化领域的合法占用时,他们可能不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构成为此需要新的能力。面对在不利的条件下花费大量时间的需求时,个人生活(在家和工作中)的压力会越来越大”^[20]。因而,更多家庭和家長被“内卷化”,从而进入一场隐性的竞争和比拼中,这也导致良苦用心的纯粹性养育常常与实际生活相分离。

我母亲很喜欢把我的成长点滴记录下来。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自由没有压力的童年。在别的家长为孩子报补习班的时候,母亲鼓励我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但在上了高中后,我不得不面对高考的竞争压力,很明显感到母亲突然加强了对我的管控。(访-L-博士在读)

尽管很多“学二代”家庭对于孩子的自主选择最初是包容和支持的,家长也想基于自

身的生命历程以及开放的教育理念,给予子代成长中相对纯粹的自由和选择环境,即使他们依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无法确定孩子未来的走向,但也愿意张着双手随时准备接住偶遇风险的孩子,但是这种纯粹性养育的背后并不是完全的放任。“学二代”家庭仍在徘徊和探寻合适的教养方式。随着社会竞争的进一步激烈,父母对于子代的未来依然充满着担忧和不确定性。他们既想为孩子打造一个相对自由的成长空间,又不敢完全放手。在教育活动中可能存在信念与行动相矛盾的现象。尽管以开放式态度支持更加多元的教育,但又常以保守的方式将孩子的分数成绩看作重要的指标^[21]。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既希望孩子能够快乐地成长,又希望他们有所成就。父母内心常常面临一种矛盾,在行动上时而张开双臂拥抱孩子,时而又给孩子施压。这源于对纯粹性养育的向往和对其中不确定性的忧虑,也是面临当今社会剧烈变革和强竞争生态的纠结和徘徊。

(二)“协同培养”模式的三种类型

“协同培养”是“学二代”家庭教育实践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家长理性规划和精心培养孩子使其顺利进入高等教育的专注方式之一。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对比了底层劳工家庭和中上层家庭培养模式的差异,其中提到“协同培养”(Centered Cultivation)是中上层家庭父母借助由自己安排管控的有组织的活动方式(尤其是业余爱好活动),确保孩子有更多的体验经历,最终在孩子心中促成一种强烈的‘优越感’^[22]。这种协同培养的文化技能,在教育场域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使孩子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和成年人对话。在协同培养的日常生活中发展起来的品质,也为孩子进入社会准备好了条件。研究中发现,“学二代”家庭的养育模式尽管在尝试“协同培养”,却分化出不同样态。

1. “高压式”协同培养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学二代”的成长空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缺少了自由和社交的空间。父母像“超人”一样,包办了他们生活中的大小事务,孩子似乎只需要专注学习和技能提升。“学霸”“精英”“全能”等标签似乎印证了可汗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中的描述:“我们好像可以用‘优秀’这个词为个体卸下社会纽带和身份的陈旧包袱,替之以个人性格特点的勤奋、守纪、具有天分和其他可以脱离社会生活来衡量的人力资本……大学入学只是他们精心经营的生活中的下一步”^[23]。圣保罗中学的“精英教育”像是一幅有规划、有目标的精准地图,父母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各类支持与帮助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的未来。家长的理性和精密规划正在逐渐走向充满教育焦虑的“高压式”协同培养。这种培养模式的背后,是忙碌的家长、奔波的脚步、学不完的才艺和不停修炼的技能。很多“学二代”家庭期望孩子走一条通过教育实现自我发展的道路,但高起点让这些孩子不敢懈怠,他们像拧紧了发条一样不停地转动。

我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在围着我转。我的成绩稍微有起伏,对于他们来讲都是天大的事,他们除了跟我谈以外,还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其实给我很大的压力,我更希望他们关注一下自己。(访-S-本科在读)

我父母都是学霸,他俩几乎包了我高中的文理科的辅导。我爸帮我复习物理,我妈帮我复习英语。在他俩的“混合双打”下,我高中本来就少的课余时间也全被占用了。虽然成绩上

去了,但回想起来简直是苦不堪言。(访-K-硕士在读)

在访谈中,一些“学二代”表示,他们的成长过程被多双眼睛注视着、被多双手扶持着,以至于需要迈着审慎的步伐前进。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所言,家长们采用一种“精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养方式,承担起全面栽培的任务^[24]。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也提到,那些看起来是天才的孩子,背后可能遭遇着“魔鬼式”训练。“直升机式父母”盘旋在孩子的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应有的样子^[25]。

2. “甜蜜漩涡式”协同培养

一些“学二代”家庭中,家长秉持着更高质量的教育理念,对于孩子的选择和想法完全给予支持和顺从,孩子从小在鼓励和夸奖的氛围中成长。由于家长的过分保护和周全计划,帮助孩子避开了很多弯路和挫折,加之不断地进行精神鼓励和赞美,这些孩子容易将顺遂的情境内化为成长的常态,并进一步延伸出对成功感的弱化和习以为常,这有可能异化为“甜蜜漩涡式”协同培养。

从小爸妈都给我极大的自由空间,小时候曾经有段时间对钢琴很感兴趣,我父母总说我是音乐的“小天才”,可是当我听到其他小伙伴弹的曲目时,我才知道自己是“小菜鸟”,父母的夸奖让我以为自己真的很厉害,而在外面则会被打回原形。(访-T-本科在读)

生活在家长的夸奖、赞许中,容易使得年轻一代分不清楚到底是真的做得不错,还是父母一贯的鼓励式教育。一旦遇到挫折或者困难,年轻一代往往会产生强烈的自我怀疑。长期沁润在夸奖和称赞中的“优等生”反而更容易因为教师的批评和成绩的些许落后而感到自责和失落。对于一些“学二代”而言,当他们进入到大学后,在同辈竞争中的落后,也会对其产生重创与打击^[26]。因此,这一群体被称为“优秀的绵羊”“娇惯的心灵”。在“甜蜜漩涡式”的协同培养背后可能产生脆弱和无法抗击风险的心灵。

3. “分工式”协同培养

研究还呈现出一类家庭景观,“学二代”家庭中父母工作繁忙,对于子女陪伴较少。家长在工作忙碌之余,通过分工完成各自的任务,但实际并没有深入到协同培养实质及产生与子代的有效沟通。这就可能出现另一类协同培养的分化,即“分工式”协同培养,当家长各自抽出时间完成“工作量”时,却可能忽略了真正的有效陪伴。

我始终想不明白,他似乎一点也没有遗传我们爱学习的基因。我们给他也辅导,还给他报了补习班,每天他爸爸去送,我下班去接。我们这么辛苦,但他好像不开窍,学习成绩就是上不去。(访-Q母-博士)

科尔曼(Coleman)也提出,“欠缺密集的亲子互动,家庭内的网络结构便会出现断裂而达不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因此,家长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影响子女教育成就的主因,而非社会阶层”^[27]。真正的文化再生产是建立在协作培养的基础上,当教育优势以象征形式客体化时,也就失去了流动传递的功能,要将其传递给下一代,需要投入时间、精力以及情感来构建亲密关系。

“学二代”家庭在探索协同培养的多种样态背后,蕴含着家庭教育参与的多重复杂性,他们也在探索和思考如何教育“适度”的问题。这条探索道路夹杂着城乡文化及社会结构性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学二代”家庭中既充满了超前的教育理念、文化优势以及以爱之名的成全与照应,但依然可能存在对子代教养的矛盾、纠结和困顿,“学二代”家庭正在举步维艰地探索一条适合自身的“协同培养”之路。

(三)“亲密有间”的家庭沟通模式

“学二代”家庭在摸索子女教养模式的同时,也会衍生出基于家庭类型结构的内部沟通模式。对于一些“学二代”家庭而言,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联,既有代际之间的亲密,又有城市居民之间无形的疏离。沉浸在中产知识分子家庭的情感生活,很容易被折叠和遮蔽,找不到言说得出口。

在城市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具有严格区分,但同时公共区域正在逐渐让渡给私人区域,家庭成员共处同一空间的时间越来越少。“学习”成为首当其冲帮助“学二代”维护私人空间的理由,父母进入其私人空间变得小心翼翼。空间的区隔逐渐形成了“亲密有间、民主清冷”的城市家庭氛围。C同学提到:

我时常觉得我们家里缺少了点什么,后来想到是烟火气。当我随爸妈回到老家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打打牌,唠唠家常。我觉得我们家里缺少这种热闹的感觉,虽然很“民主”,但多少有些冷清。(访-C-本科毕业工作)

因此,以个人中心为新型家庭模式可能带来紧密性家庭关系的解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互不干涉,意在减少代际矛盾和冲突,却在让渡共同空间的过程中,家庭成员的有效情感交际逐渐减弱。美国社会学家埃拉特(Allatt)认为,情感价值、技能、爱和感情、花费的时间、注意力、关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情感储蓄,支撑较长生命线的发展^[28]。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父母忙碌的脚步、孩子上不不完的补习班以及沉重的作业负担,常常割裂了“学二代”家庭中两代人深度沟通的时空,稀释着代际传递的情感功能。安妮特·拉鲁对比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家庭时发现,“尽管工人阶层的孩子在教育和文化上的优势较少,但是孩子在自然成长的过程中体验到长时间闲暇时光,而中产阶层的孩子尽管获得了教育的优势,但是却漏失了与父母和亲戚之间的联络以及自己的闲暇时间”^[29]。即使在代际沟通中出现矛盾,父母更倾向于规避直接的代际冲突,但也可能错过最佳的沟通机会,从而导致一种情感的隐匿、躲避和压抑。

年轻一代往往以“代沟”之名将私人空间与父母隔离开。他们通过减弱对父母的依附关系,实现自我权力的提升和个人空间领域的延展。O同学在访谈中提到,“大四以前还是父母主要支持我的生活费和学费。大四以后我觉得经济独立是精神独立的基础。因为我觉得这样他们也可以少管点我,少受他们的控制”(访-O-硕士在读)。“学二代”家庭中父辈对子代理性的情感表达,子代对父辈亲密有间的沟通,维持着相对稳定且和谐的距离,但“学二代”个人生活世界的脆弱、迷茫、孤独却容易被忽视,他们如何在家庭协同培养中进行自我寻觅,在文化再生产的命运流转中探寻自我价值将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中“学二代”的家庭图景复杂多样。有别于农家子弟家庭中的“爱怨交织”^[30],也

有别于有闲阶层的生长逻辑,“学二代”的家庭图景有着中产阶层自身家庭结构难以超越的矛盾与遮蔽,衍生着属于“学二代”家庭理性克制而又亲密有间的代际沟通模式。城市中的新型家庭模式逐渐形塑“学二代”不同于父辈的性格特征和惯习文化,他们有着明确的个人中心意识,重视自我空间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在成长过程中依附家庭,但同时也不断做着独立的准备。他们感受着家长无处不在的关爱和用心良苦,却又觉得缺乏关爱和认可。因此,“学二代”家庭中多种样态的家庭教育图景和成长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拥有教育优势的“学二代”与家庭、学校、社会甚至是自我的内部拉扯以及内在冲突。

五、结论与讨论

在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布尔迪厄认为中上阶层子弟更容易获得一系列由家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协助他们接受学校教育和步入社会场域,从而更好地实现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学二代”家庭尝试摸索纯粹性养育道路,但依然通过全面参与、系统规划和精细培养为孩子的发展提供稳定庇护。尽管“学二代”的发展路线不同,但是在揭开“学二代”背后的光环,深入到家庭内部的生活图景时,能够得出初步的结论:“学二代”家庭甚至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教养和孩子的成长,并不像布迪厄描述的那样顺遂。在具有文化优势的同时,他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危机、拉扯和困境。虽然“学二代”家庭模式各不相同,但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依然在探寻合适的教养路径。

第一,教育环境的影响。从宏观背景看,我国中产阶层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显现,中产阶层队伍不断变化是当前社会转型阶段的突出表现。伴随着毕业分配政策的取消和城市社会的竞争加剧,教育焦虑也成了中产家庭共同的群体色调^[31]。无论是企业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工程师、律师、教师、医生、记者、白领等,传递给子代的物质资源、社会资源往往有限,又不能直接将教育和文化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因此,中产阶层群体内部竞争激烈。有研究表明,企业家帮助孩子进入好的私立学校、报各类辅导班,从而弥补自身教育的短板;管理者通过社会网络帮助孩子寻找和推荐优质的学校资源,从而帮助孩子提升学业成绩^[32]。但对于中产知识分子家庭而言,却不能立即将自身的教育优势转换为物质或社会资源传递给下一代。该过程需要在时间和精力上长期投入,才能帮助子代获得文化资源。因此,更多的城市中产知识分子家庭希望通过教育为孩子建构多重光环^[33],进而获得高薪收入的工作和可靠的社会保障。

熊丙奇提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时代,2019年各地高考录取率都超过80%,这比曾经中产阶层子弟的高考录取率已经提高3倍多。但是父辈依然感到焦虑。事实上,这种教育焦虑的原因主要是名校竞争变得更激烈”^[34]。迪马乔(Paul DiMaggio)在“文化流动理论”中也提到:“在现代社会,由于城市化推进、教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社会交往不再局限于小范围封闭的社会交互群体,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扩大化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场所中习得文化资本”^[35]。因此,在激烈的竞争中,劳动阶层家庭子女很可能将一些中

产阶层孩子排挤到成绩排名的后端。同时,占据更多资源的个体,由于具有厚实的家庭资源和储备,除了升学考试外,他们的选择更加多样化。很多家庭不只是期望孩子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好大学。正如米尔斯指出,生存的竞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36]。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学二代”家庭容易把所有的教育愿望放在孩子身上。家庭中的儿童中心地位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也放大了家庭对孩子的关注。他们既想让孩子过得幸福,又想让孩子获得成就。这种双重情感,既可能带来家庭文化传递的集中和高压,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出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叛逆和困境。

第二,趋于更高学历水平教育的影响。当教育焦虑愈演愈烈的时候,越需要对文凭和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在现代社会,文凭愈加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水涨船高^[37]。这也恰恰是布尔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所印证的,人们都在增加教育的砝码,也进一步认同在合法性文化中文凭的价值。当文凭与工作薪酬、社会地位挂钩时,也就说明它的功能性价值愈发明显。

对很多人来说,获取更高文凭不再是源于对知识的热爱、科学研究的兴趣,而是延缓就业压力的方式或保护家庭资源的路径选择。在包括耶鲁、哈佛在内的顶尖名校中,众多学生开始涌向与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威廉·德雷谢韦奇指出,“很多顶尖名校尽管拒绝提供类似职业技校的教育,但实质上就是职业技校。所有的一切都以技术为中心。虽然名校宣称其教学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他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学生分析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职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38]。

更高学历水平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自由的文化氛围,却又用精细化的课程将学生束缚在指向未来的一系列安排中。在紧锣密鼓的日程计划中、不同课程的快速切换中、社会团体的匆忙往复中,他们不敢停下脚步,也不能为大学的空隙留白。他们像不停旋转的陀螺,努力获得当下文凭,又将当下文凭投入下一场教育的竞争中。最终,技术功能论背后是大量的获奖证书、文化技能、科研项目的叠加。当一群优秀的孩子生活在竞争中,有多少人不断在竞争性的层层选拔中获取着成功,又有多少人会遭遇失败?很多高学历水平教育下的孩子会将文凭的认同、成绩的认同、父母的认同最终等同于自我认同,但是最终很少有时间关照自己的内心以及成长过程。

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回到“学二代”家庭本身,面对社会竞争下的教育焦虑、技术功能论下的文凭取向,“学二代”家庭的文化机理能够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学二代”似乎生成着有别于上一代教养逻辑的生活样态,寻找着与自身契合的文化生产和文化理解。他们想要突破文化再生产的束缚,可能打破一种固有模式的照拂,也可能是另辟蹊径的寻觅。法国社会学家伯纳德(Bernard Lahire)也提到:“尽管文化再生产是同一个人或至少某个社会类别或教育水平的个人实践构成一个系统。但当添加了多个文化场域时,更有可能出现两种文化实践之间的冲突。具有完美连贯的形象似乎发生了割裂”^[39]。这说明家庭代际文化传递的差异一方面是多种整合的文化倾向和能力之间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文化背景多样性的相互作用。这也为解释具有相似教育程度的“学二

代”家庭为什么会呈现多样态的家庭图景提供了可能性,也为挖掘隐藏在文化再生产之下文化创生提供了可能性。

在当前社会情境下建构起来的“学二代”家庭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恰恰不是教育焦虑关注的文凭和学历,而是对于知识追求的纯粹性和对于外部世界不断学习的内生力量。这些力量作为一种文化特质曾帮助“学一代”走出大山,打开自我与世界对话的宽度,也有可能帮助“学二代”持续更新着对于世界的认知,不断地探索自我能力的边界。尽管这些内生力量可能伴随着文化再生产和文化生产的对峙,但其自身的纯粹性是“学二代”家庭中宝贵的文化优势,存在于家庭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建构着新知识分子家庭的独特性,也是“学二代”家庭在历史文化穿梭和文化折皱中所形塑的特殊文化底色。

尽管当下“学二代”家庭可能依然在探索最优的教养方案,承受隐匿在斗室之中的教养风险,但也可能率先思索教育的超越性,跳脱现代社会“教育内卷”的困局,成为最早回到教育本质的“反思者”。在新时代背景下,即便当前造成教育焦虑和内卷的社会性、文化性、结构性的困局一时难以改变,但如若“学二代”家庭能更好地看到自身的文化魅力与价值,加强良好有效的代际沟通、增强对子代学业以外的心灵关注,就可能探寻出符合孩子成长特点的教养路径,在社会环境愈加包容、人才评价标准逐渐多元的支持下,他们将可能作为“引领者”逐渐从教育焦虑的泥沼中走出来,更好地展开对自身教育体验及其背后诸种教育模式的反思,新一代知识分子真正的文化魅力和教育洞见或可在此过程中成长并结出果实。

[参 考 文 献]

- [1] Gofen, A.. Family Capital: How First Generati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Break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Discussion Paper, 2007, (1).
- [2][7] 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版,第32、25页。
- [3][8]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79-81、84-85页。
- [4] 布尔迪厄 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 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版,第32-34页。
- [5] Lareau, A..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 - 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7, 60.
- [6] Lareau, A., Horvat, E. M.. Moments of Social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Race, Class,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Family - school Relationship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99, 72.
- [9] 刘云杉:《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2期。
- [10] Stephen, J. Ball. Class Strategies and the Education Market: the Middle Classes and Social Advan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69 - 78.
- [11] Horvat, E. M., Weininger, E. B., Lareau, A.. From Social Ties to Social Capital: Class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ools and Parent Networks, in H. Lauder, P. Brown, A. Dillabough, A. H. Halsey (Eds.), Education,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Cha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454 - 467.
- [12] Brown, P..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Exclusion: Some Observations on Recent Trends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the Labour Market, in A. H. Halsey, H. Lauder, P. Brown, A. S. Wells (Eds.),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736 – 749 .

- [13] Tsang, E. Yh.. The Quest for Higher Education by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 Retrenching Social Mobility? Higher Education , 2013 , 66.
- [14] Norman , K. Denzin.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 New Delhi : Sage , 1987 , p.83.
- [15] 刘祎莹:《文化折叠——“学二代”家庭代际文化的传递和冲突》,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 [16] [37] 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刘 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版,第4 – 5、6页。
- [17]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 舒 凌旻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版,第12 – 33页。
- [18] 康永久:《先验的社会性与家国认同:初级社会化的现象学考察》,载《教育学报》,2014年第3期。
- [19] Bernstein , B.. Class , Codes and Control : Towards a Theory of Education Transmission , London : Routledge , 2003 , pp.107 – 124.
- [20] Lahire , B.. Sociological Biography and Socialisation Process : a Dispositionalist – contextualist Conception ,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 2017 , (11) .
- [21] Brantlinger , E. , Majd – Jabbari , M.. The Conflicted Pedagogical and Curricular Perspectives of Middle – class Mothers , in S. Ball (Ed.) , Sociology of Education : Major Themes , London : Routledge Falmer , 2000 , pp.1582 – 1616.
- [22] [29]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张 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 – 3、4页。
- [23] 西莫斯·可汗:《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蔡寒韞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版,第29 – 37页。
- [24] [38] 威廉·德雷谢维奇:《优秀的绵羊》,林 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版,第37、58页。
- [25] 格雷格·卢金诺夫 乔纳森·海特:《娇惯的心灵:钢铁是怎样没有炼成的》,田 雷 苏 心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版,第229页。
- [26] 刘祎莹:《精英大学中的“寻游者”——关于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另一种言说》,载《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 [27] Coleman ,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 in E. Ostrom , T. K. Ahn (Eds.) , Foundations of Social Capital ,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2003 , pp.159 – 184.
- [28] Allatt , P.. Becoming Privileged : the Role of Family Processes , in I. Bates , G. Riseborough (Eds.) , Youth and Inequality , Buckingham : Ope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39 – 159.
- [30] 程 猛 康永久:《从农家走进精英大学的年轻人:“懂事”及其命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5期。
- [31] 苏海南 王 宏 常凤林:《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114页。
- [32] [36] 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6 – 7、8页。
- [33] Liu , Y. , Huang , Y. , Shen , W.. Building Halos : How Do Chinese Elites Seek Distinction through (Mis) Recognizing Studying Abroa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 2022 , 91.
- [34] 熊丙奇:《高考重回千万意味着什么?》,载《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9年第4期。
- [35] Mohr , D. M.. Cultural Capital , Educational Attainment , and Marital Selection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85 , (6) .
- [39] Lahire , B.. Sociolog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 Psychologies and Neurosciences ,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 2020 , (1) .

(责任编辑:刘 彦)